

# 《四库全书》与清代吴地《诗经》学

刘立志

〔摘要〕《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的著评都与吴地《诗经》学者存在密切关联。民间进献之《诗》学图书多有出于吴地藏书家者。清廷关注吴地文化与学术,斟酌收录当下吴地学者的《诗》学著作,内中隐含有政治考量,顾栋高、李光地与杨名时学派皆受到特殊的青睐。

〔关键词〕《四库全书》;吴地;李光地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清高宗下诏开设“四库馆”,调集文臣学士纂修《四库全书》,至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第一分《四库全书》告成,入藏文渊阁,翌年九月文溯阁《四库全书》缮竣,后来又加以续缮、撤改、复校,至于乾隆皇帝退位才算正式完工,前后历时22年。后来又组织学者为收录的书籍撰写提要,汇集而成《四库总目》,内中涉及对于古今《诗经》研究的把握与认识。《四库全书》的编纂、《四库总目》的著评都与吴地《诗经》学者存在密切关联。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称说“吴地”范畴涵盖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等五个区域。

## 一、吴地征书与献书的互动

《四库全书》纂修之初始,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即下诏指令地方政府动员全国民间进献藏书,但是一年之间应者寥寥。乾隆三十八年(1773)三月十八日再次下诏呼吁“购访遗书”,发动两江总督、两淮盐政、浙江巡抚等要员访查藏书旧家。档案记载之中,受访的江浙藏书旧家包括徐乾学之传是楼、钱曾之述古堂、朱彝尊之曝书亭等。乾隆皇帝还曾在上谕中指名让苏州山塘书肆的书贾钱金开与陶廷学、湖州书船的贾客协助搜访,足见乾隆皇帝深知包括吴地在内的江浙区域实乃人文渊薮,民间收藏图书极其丰富,资料文献足备采用。皇帝一再下诏求书征书,朝廷的献书令终于得到臣僚、藏书家的热烈响应,因此《四库全书》的底本除了各省采进本、内府藏本刻本、《永乐大典》本以外,还有大量由各地藏书家进献而来的。至编纂《四库总目》之时,乾隆帝还特别发布谕旨,命令将献书甚多的藏书家姓名“附载于各书提要末”,为后人提供藏书线索。

《四库全书》收书截止于乾隆中期,配套汇集所收诸书提要的《四库总目》初稿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刊刻颁布,其总纂官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陆氏乃吴人。《四库总目》于“诗类”评论了《诗》学著作63部(包含附录1部)、941卷,存目提要著录《诗经》研究专著

刘立志,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210097)。

84 部、913 卷,两者合计 147 部 1854 卷。馆臣总计评论了清初至乾隆时期百余年间《诗经》研究著作 57 部,其中著录清人《诗经》著作 22 种,存目著录清人《诗经》著作 35 种。

《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书的底本,按照其来源,可分为内府本、赞撰本、各省采进本、通行本、《永乐大典》本六类,其纳录途径主要包括各省购买、私人献纳、馆臣辑佚等。就献纳来说,有学者统计《四库总目》中注明的藏书人姓名,发现,“献书人中,仅三分之一为藏书家,二分之一为馆臣,三分之一为其他人员(因藏书家与馆臣有重叠者)。藏书家中以江浙为多,除黄登贤、纪昀、孔昭焕、李文藻、励守谦、翁方纲、熊志契、周永年、朱筠外,其余 20 多人均出自江浙。进呈图书最多的是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和马裕,堪称四大藏书家,只有马裕在扬州,其他三家皆在浙江。江浙藏书家又多系皖籍商人,如鲍士恭、程晋芳、马裕、汪启淑、汪汝璥、汪汝藻、吴玉墀等人均是”<sup>①</sup>。献书群体中出于吴地者,郑伟章《书林丛考》梳理有:程景伊,武进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2 种;蒋曾莹,苏州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1 种<sup>②</sup>;陆锡熊,上海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21 种;闵惇大,乌程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 种;彭绍观,长洲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 种;王昶,松江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3 种;徐天柱,德清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5 种;许宝善,上海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 种;严福,世居吴县,寄居青浦县,《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 种;周厚埭,上海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62 种<sup>③</sup>;邹炳泰,无锡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1 种;祝德麟,海宁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2 种;朱彝尊,秀水人,《四库总目》著录其家藏本 33 种。吴地学者和藏书家积极进献书籍,为《四库全书》的编纂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吴地人杰地灵,文化先进,洵为不虚。

二、四库入选吴人《诗》学著述之统计

《四库总目》评介清代《诗》学著述 57 部,其中出于吴地学人之手的共有 17 部,其书名、作者、籍贯、献书者信息列表如下:

表 1 《四库总目》所存吴地学人评介清代《诗》学概况

序号	位置	书名、卷数	作者	作者籍贯	献书信息
1	著录	《毛诗通义》12 卷	朱鹤龄	吴江	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2	著录	《毛诗稽古编》30 卷	陈启源	吴江	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3	著录	《诗说》3 卷	惠周惕	长洲	江苏巡抚采进本
4	著录	《读诗质疑》31 卷附录 15 卷	严虞惇	常熟	江苏巡抚采进本
5	著录	《毛诗类释》21 卷续编 3 卷	顾栋高	无锡	江苏巡抚采进本
6	著录	《诗疑辨证》6 卷	黄中松	上海	江苏巡抚采进本
7	著录	《虞东学诗》12 卷	顾镇	常熟	安徽巡抚采进本
8	著录	《诗本音》10 卷	顾炎武	昆山	安徽巡抚采进本
9	著录	《毛诗古义》	惠栋	吴江	桂林府同知李文藻刊本
10	存目	《毛诗日笺》6 卷	秦松龄	无锡	两江总督采进本
11	存目	《诗经比兴全义》1 卷	王钟毅	华亭	江苏巡抚采进本
12	存目	《诗经惜阴录》20 卷	徐世沐	江阴	两江总督采进本
13	存目	《诗经集成》30 卷	赵灿英	武进	江苏周厚埭家藏本
14	存目	《陆堂诗学》12 卷	陆奎勋	平湖	浙江巡抚采进本
15	存目	《诗经广大全》20 卷	王梦白、陈曾	无锡	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16	存目	《毛诗说》2 卷	诸锦	秀水	浙江巡抚采进本
17	存目	《诗贯》18 卷	张叙	镇洋	浙江吴玉墀家藏本

①郑伟章:《书林丛考》,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第 401 页。  
②根据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上谕,蒋曾莹进呈书籍达百余种,得赏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帝还曾在其进呈的《职官分纪》书首题诗一首。  
③根据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初四江苏巡抚萨载奏折,周厚埭进呈之书,除去重复及残缺不全外,共计 366 种,得赏内府初印之《佩文韵府》一部。乾隆帝还曾在其进呈的宋本《两汉博闻》书上题诗一首。

此外,《四库总目》于五经总义类存目载录常熟沈淑编《经玩》20卷,山西巡抚采进本,评论言及丛书中收录的沈淑《毛诗异文补》,“全引伪申培《诗说》,尤失考也”;又载录吴江李重华《三经附义》6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其说《诗》较二经(按:指《周易》和《尚书》)为详,颇欲推求言外之意,胜于株守文句者,而亦每以好生新意失之”;还载录太仓周象明《七经同异考》34卷,江苏巡抚采进本,其中包含《诗》6卷,这些著作因以丛书形式流布,上表并未计入。

从《四库总目》收录的吴人《诗》学著述的采进来源看,它们并非全部来自江浙地区,而是涵盖江西、安徽、桂林诸地区,说明这些图书在赣、皖、桂都有一定的流传,泽溉学林,其影响并不为撰著者的乡里籍贯所局限。

### 三、《四库总目》对于清代吴地《诗》学之评价

《四库总目》将收录的图书区分为著录书和存目书两类,也有学者表述为“编录”书与“存目”书,或者“收录书籍”与“著录书籍”,分类名目之中已经隐含了对于图书学术价值上下的评判,但书中对于清代吴地《诗》学的认知与评论远不止一分为二这么简单。

何海燕发表有专题论文,分析《四库总目》对于清初《诗》学的认识,指出从总目看,清初百余年间的《诗经》总体研究可分为三家:宋学派、汉学派与汉宋兼采派。宋学派以朱子《诗集传》为宗,或兼采他说,或参以己意,赵灿英著述属于此派。汉学派以毛郑为宗,或兼采古说,或参以己说,陈启源、顾栋高著作属于此派。而汉宋兼采派不主一家,兼采众说,涵盖严虞惇、惠周惕、顾镇等人。“可将这一时期的诗学概况为:推求诗意与训诂名物共存,臆说与考证兼有,没有学术价值的科举用书依然有市场”<sup>①</sup>。她将《总目》所反映的编纂者的《诗经》研究观念概括为三点,一是复古与征实,包括研究方法上的复古,即回复到东汉时期用训诂说《诗》的路数上去,也包括文献材料上的复古,即主张采用古义、古说来说《诗》;二是经学正宗思想,坚持以诗教观、美刺观说《诗》;三是反对以门户说《诗》,提倡不拘守一家之言。这个见解是比较深刻的。

《四库总目》对于吴地学者《诗》学著作信息的了解比较全面,评析比较中允,如指出朱鹤龄《毛诗通义》和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原本两人互相商榷问题而成书,“二书固相足而成也”,稍后的周中孚《郑堂读书记》甚且认为“后之人诚能取二书会而通之,傅以近儒之说,依《集传》次序,别一书,庶使讲宋学者知所改辙焉”<sup>②</sup>。《总目》以“征实”为标的,衡量考论诸书,如评价严虞惇《读诗质疑》“非惟不存门户之心,亦并不涉调停之见”,评黄中松《诗疑辨证》“考证讹谬,校定异同,其言多有依据。在近人中,犹可谓留心考证者焉”,评秦松龄《毛诗日笺》“大旨多以意揣之,不尽有所考证也”,评徐世沐《诗经惜阴录》“循文衍说,于《诗》教未得其要领也”,不足之处极其突出。在《总目》编纂者看来,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编》是个中翘楚,堪为楷模,“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正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盖明代说经,喜骋虚辨。国初诸家,始变为征实之学,以挽颓波。古义彬彬,于斯为盛”,可谓极力标举,赞誉有加。

批评和赞扬之外,还有态度更甚者,不加一词,迹近鄙视,如《总目》于存目认为赵灿英《诗经集成》“大旨为揣摩场屋之用”,王钟毅《诗经比兴全义》“盖专为科举作也”,平实叙述其内容与体例,绝无称道之语,这与乾隆朝对于制艺类书籍的定性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是主旋律。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谕令征集图书,明文有言“除坊肆所售举业时文,及民间无用之族谱、尺牘、屏

<sup>①</sup>何海燕:《从〈四库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sup>②</sup>周中孚:《郑堂读书记》,黄曙辉、印晓峰标校,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章、寿言等类,又其人本无实学,不过嫁名驰鹜,编刻酬唱诗文,琐碎无当者,均毋庸采取外,其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sup>①</sup>,明确规定了采集载录图书的范围,主要是“关系世道人心”的儒学经典与史学经典,时文、应用类文字、应酬类文字皆在摒弃之列。综合说来,清廷对于制艺类书籍的态度比较矛盾,呈现出摇摆不定的态势。顺治时期,政府下令禁止坊间选刻时文、表策;乾隆帝即位后,曾一度比较宽容,乾隆元年(1736)六月,下谕弛坊间刻文之禁,准许民间将乡、会试佳卷照前选刻,又命将前明及本朝诸大家时艺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行天下。但是在启动《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前后,乾隆帝对于这类书籍比较排斥,至于嘉庆年间,对于此类书籍还是袭用查禁政策。

#### 四、由政而学:顾、李、杨三人最受青睐

《四库全书》及《总目》对于清人著述的选择载录,情形不尽相同,按照陈新先生的观点,《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是“稽古右文”,后来才转为“寓禁于征”<sup>②</sup>,突出了意识形态要求。在此前提之下,清代《诗》学著述的入选,还夹杂有其他因素,如人情献纳。周春《毫余诗话》卷二云:“《四库全书》载近时人著述甚少,通计不过十余人,而余甲戌同榜得三人焉,顾古湫镇、姜白岩炳章、范蘅洲家相,皆晓岚先生力也。”<sup>③</sup>甲戌为乾隆十九年(1754),纪晓岚亦徇同年之情而将三人著作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其中,顾镇为江苏常熟人。

吴人《诗》学著作的取舍,最重要的标准还是政治因素,获蒙圣意垂青之人的著作入选,无疑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顾栋高、李光地与杨名时可作为明证。

《四库全书》收录顾栋高的著作凡三种,包括《大儒粹语》28卷、《尚书质疑》2卷、《毛诗类释》21卷、《续编》3卷、《春秋大事表》50卷、《舆图》1卷、《附录》1卷。顾栋高之声名早已达致天听,受到关注。乾隆十六年(1751),顾栋高荐举经学,五月二十七日(阳历7月19日),乾隆帝令将保举经学之陈祖范、吴鼎、梁锡珣、顾栋高的著述送阅;八月初三日(阳历9月21日),谕保举经学之陈祖范、顾栋高年历老迈,不能来京,俱著给与国子监司业职衔,以为绩学之助。《四库总目》收录江苏巡抚采进本“《毛诗类释》21卷、《续编》3卷”,言“是编成于乾隆壬申。《序》文、案语皆称臣,盖拟进之本”。壬申年即公元1752年,时为顾栋高授职的第二年。顾氏著述经过乙览,即予以职位,君上印象应是极佳,后出新著理应跟进呈上,此亦为人情常理。而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日(2月7日),乾隆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谕旨中明言“又如历代名人,洎本朝士林宿望,向有诗文专集,及近时沉潜经史,原本风雅,如顾栋高、陈祖范、任启运、沈德潜辈,亦各有成编,并非剿说、卮言可比,均应概行查明。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只系钞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全文详见《清高宗实录》卷九〇〇。专门拈出顾氏的名姓,馆臣顺应圣意,将顾氏著作搜集录入,自是理所当然与必然。

《四库总目》对于李光地、杨名时学派的褒扬与认可,更为显明。此派师生著作收录情况如下:

李光地《御纂周易折中》二十二卷首一卷、《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十二卷、《尚书解义》一卷、《诗所》八卷、《朱子礼纂》五卷、《古乐经传》五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断》一卷、《中庸余论》一

<sup>①</sup>《清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页。

<sup>②</sup>陈新:《是“稽古右文”还是“寓禁于征”——析〈四库全书〉纂辑的动因》,《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又收入漆永祥、王岚编:《锦衣为有金针度:陈新古籍整理与古典文学研究论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

<sup>③</sup>转引自蒋寅:《金陵生小言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第73页。

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札记》二卷、《注解正蒙》二卷、《榕村语录》三十卷、《御纂性理精义》十二卷、《榕村集》四十卷、《钦定音韵阐微》十八卷、《御定月令辑要》二十四卷图说一卷、《御纂朱子全书》六十六卷、《星历考原》六卷。

李光地之弟李光坡《周礼述注》二十四卷、《仪礼述注》十七卷、《礼记述注》二十八卷。

李光地之子李钟伦《周礼训纂》二十一卷。

李光地弟子惠士奇《易说》六卷、《礼说》十四卷、《半农春秋说》十五卷。

李光地弟子何焯《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

李光地弟子杨名时著作《周易札记》二卷、《诗经札记》一卷、《四书札记》四卷三种。

《四库全书》收录李、杨二人子侄、门生著作如此之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二人的政治地位所致。

李光地(1642—1718),光地字晋卿,号榕村、厚庵,卒谥文贞,福建安溪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改庶吉士,后迁翰林院学士,十九年(1680)授内阁学士,二十五年(1686)授翰林院掌院学士、充经筵讲官,后擢兵部右侍郎,迁工部左侍郎。三十七年(1698)授直隶巡抚,累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光地学宗程朱,为康熙朝理学名臣,深受康熙帝宠信,曾先后奉命承修《周易折中》、《御纂性理精义》21卷、《钦定音韵阐微》18卷、《御定月令辑要》24卷图说1卷、《御纂朱子全书》66卷、《星历考原》6卷等。彭绍升《故光禄大夫文渊阁大学士李文贞公事状》云:“(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圣祖御乾清门,命公奏进家居所著文字。公汇其读书笔录及论学文字为1卷,叙而进之。”<sup>①</sup>又云:“四十四年十一月,授文渊阁大学士,召还。时圣祖临御久,日潜心六艺之文、河图象数之学,下逮濂洛关闽之书,旁及历算、声音之道,反覆研索,有原达流。公固笃信程朱,因以上窥羲、文之秘,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未尝不称善。凡御定诸书,多委公参定,中有淆赜,往复陈情不倦。故最后圣祖诏廷臣言:‘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sup>②</sup>君臣关系极为融洽,颇有知己之感,后来虽有被斥为“伪道学”之波折,但康熙帝对其宠信如故。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亲征葛尔丹时,寄给敬事房总管即总首领太监督问行的谕旨之中有两条,一则云“一匣薰鲜细鳞鱼、一匣鲜鹿肉条,交南书房送到大学士李光地处敬事房”,另一则云“京中南城水甚是不堪,李大学士肚腹不好,须得好水才好,尔等每日将玉泉山水交与他家人带去,非此水不可吃,照此传给李大学士知道”。<sup>③</sup>细致贴心,亲热似家人,对李光地可谓关怀备至,迹近佳话。雍正时期,李光地曾经被奉入贤良祠,春秋受祀。

李光地为政坛成功人士,学术研究方面也极有成绩,在经学、乐律、音韵等领域造诣颇深,撰著有《周易通论》4卷、《尚书解义》1卷、《周礼纂训》21卷、《春秋毁余》4卷、《四书解义》8卷、《论孟子札记》4卷、《古乐经传》5卷、《韵书》、《榕村语录》30卷、《榕村全集》40卷等多种,加之他乐于奖掖士子,提携后进,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清史稿》卷二九〇论曰:“圣祖以朱子之学倡天下,命大学士李光地参订《性理》诸书,承学之士,闻而兴起。(方)苞与光地谊在师友间,(杨)名时、(王)兰生、(魏)廷珍、(蔡)世远皆出光地门。(胡)煦亦佐光地修书,得受裁成于圣祖。叔琳,苞友,鉉又出世远门,渊源有自。”

杨名时(1660—1736),字宾实,号赓斋、凝斋,谥文定,江苏江阴人。康熙三十年(1691)进士,历任翰林院检讨、顺天学政、贵州布政使、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等。杨名时仕途顺达,深受皇帝之垂青。卢文弨《杨文定公家传》:“(康熙)五十六年,圣祖特用为直隶巡道,谕曰:‘欲试尔民事也。’时直隶尚未设三司,以巡道主刑狱,兼驿传,案丛事猥,吏因缘为奸。公至,釐革殆尽。圣祖闻其政

<sup>①</sup>钱仪吉:《碑传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34页。

<sup>②</sup>钱仪吉:《碑传集》,第337页。

<sup>③</sup>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670页。

声,谓大臣曰:‘杨名时不特是清官,实好官也。’”<sup>①</sup>不过后来因题本误载密谕获罪,遂以借欠亏空等事被革职。乾隆帝即位后,又召为礼部尚书兼国子监祭酒,但不久即过世,朝廷命入祀贤良祠。

杨名时著作颇丰,有《周易札记》3卷、《诗经札记》1卷、《四书札记》4卷、《经书言学指要》1卷、《辟雍讲义》1卷、《大学讲义》1卷、《中庸讲义》1卷、《程功录》4卷、《杨氏文集》12卷等,后其门人将其所著之书辑为《杨氏全书》。

杨名时的著作曾经受到康熙皇帝的关注。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帝亲征葛尔丹时,寄给敬事房总管即总首领太监顾问行的谕旨之中言及:“朕看杨名时讲论《易经》不过举业,文章则可,若精求河洛渊源之理似乎不能。又议论与熊赐履旧日所讲相同处颇多,他说先天、后天乃文王将《乾卦》据理直安在西北去,不必求其数等语,甚难晓其意思,故问卿他说的有些理否?”<sup>②</sup>也算是受知于君上。

杨名时出于李光地之门,但是其学术后来居上,超出乃师,唐鉴《清儒学案小识》评论云:“先生从李文贞(光地)问学,而闾然为己,则其自得者也,不尽出于师授。平时省察缜密,推勘精严,札记、讲义诸篇,往往能补师之所未及。读其书,想见践履之笃实,操持之坚苦,以视夫讲学家之笼统陵驾居之不疑者,相去远矣。”杨名时弟子有夏宗澜、王文震、靖道谟等人。其交游者有方范、黄叔琳、冉觐祖、朱轼、徐用锡、秦蕙田、蔡德晋、庄亨阳、官献瑶、徐恪等。

政坛长青,治学有成,学林仰望,李光地、杨名时俨然成为学派领袖,他们的著作被四库馆臣重点关注辑录,自在情理之中,并且此举暗中投合了君主的趣味,没有任何政治风险,馆臣何乐而不为?

## 五、《诗》学中的李、杨学统

深入探索,会发现四库收录的清代吴人《诗》学著述里,李光地、杨名时一系数量居多,洵为最大赢家,只是线索散乱,较为隐微,故有稽考之必要。

李光地著有《诗所》8卷,杨名时著有《诗经札记》1卷,皆见录于《四库全书》及《四库总目》,但这还远不能概况其学派及辐射关连学人三百篇研究的整体成就,关涉吴地学人但并不局限于三吴范围。

康熙年间,李光地奉敕编纂篆文六经四书10种,《四库采进书目》于“武英殿第一次书目”载录有《篆文诗经》4卷。

李光地的侄子李钟乔撰有《诗经测义》4卷。李钟乔(1689—1732),字世邠,号柳亭。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丞、江西学政。著有《易说》《尚书典谟》《论语孟子讲蒙》等。《四库全书》收录《诗经测义》一书,《总目》卷十八有论,云:“是编不载正文,随其所见,各为评论。大旨以夫子未尝删诗,特据所得编之而已。若谓三千删为三百,则春秋时君卿大夫所赋多三百篇中所有,且其人皆在夫子之前,岂能预合圣人之意而去取之?风雅正变之说亦难据。《楚茨》以下《瞻洛》诸篇皆承平之作,而列之于变。平王之孙列在二南,编诗不必以正变为底昂,不必以世代为前后。其持论类皆如此。至如释《关雎》首章非宫人作,乃世臣承命襄事而赋之。其次章盖博求四国,未得其人,故忧至于反侧。释‘虽则如燬’句,谓役于王室而归者,其室家劳之。如此亦多前人未有之说也。”认可他的新见。

李光地的弟子冉觐祖著有《诗经详说》。冉觐祖(1637—1718),字永光,号蟬庵,河南中牟人。康

<sup>①</sup>钱仪吉:《碑传集》,第792页。

<sup>②</sup>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第670页。

熙三十年(1691)进士,授翰林院检讨。著有《易经详说》《书经详说》《寄原堂文集》等。《四库全书》载录《诗经详说》,《四库总目》评云:“是书以朱子《集传》为主,仍采毛、郑、孔及宋元以下诸儒之说附录于下。每章《小序》与《集传》并列。盖欲尊《集传》而又不能尽弃《序》说,欲从《小序》而又不肯显悖《传》文,故其按语率依文讲解,往往模棱,间有自出新意者。”

李光地的弟子杨名时除《诗经札记》外,另有《诗易讲授》一书。《四库采进书目》于《两江第一次书目》著录杨名时撰《诗易讲授》。尹会一《健余先生文集》卷二有《诗易随记序》,云“庚申之秋,予陈情旋里,过保阳,馆于莲池书院。因得识山长夏君”,“嗣乃悉其旧游于江阴杨文定公之门,由文定以上溯文贞《诗》《易》之学,师弟间问辨,多年相说相长,义举其大而旨探其微,爰是笔之于书,得《诗易讲授》若干卷。”蒋秋华云:“从据安靖《序》有云:‘夏子起八,负颖异之资,自吴走滇,从先生受经学,历八年正。今春将告归,示余以《易义随记》8卷、《诗经语录》4卷。’所谓《诗经语录》,当即此书(按:指《诗义记讲》)。”

杨名时的弟子夏宗澜撰有《诗义纪讲》4卷。夏宗澜(1699—1764),江苏江阴人,拔贡生,曾任国子监助教,著有《易义随记》《易卦札记》等。《诗义纪讲》一书,《碑传集》卷二十四卢文弨《杨文定公家传》认为此书乃杨氏门人辑其说经之言。张寿林提要云:“稽其所记,或为名时说《诗》之语,或为宗澜与名时质疑问答之辞。大旨以安溪李光地《诗所》为本,反覆推阐,以发明《诗》旨。盖名时尝游学于光地之门,而尽得其传。附沈潜诸儒之言,故其说《诗》,多笃守光地之说,而斟酌于《小序》《朱传》之间。”蒋秋华《清代诗经学考述》则曰:“是书四卷,卷首标题江阴杨名时讲授,然书前有雍正十年(1732)名时之《序》,谓雍正三年,宗澜来滇,以李光地《诗所》相示,名时受而读之。七年,名时以《诗所》作讲诵课程,宗澜因记所讲说,并存己所推论参质者,俟再研讨。十年,宗澜将归,乞名时作序。据此,则虽非名时自著,亦宗澜记其所述,益以己说而成。是书即宗澜所记《杨文定公诗易讲授》之一。”

杨名时的弟子徐铎撰有《诗经提要录》30卷。徐铎(1693—1758),字令民,号南冈、枫亭,江苏盐城人。雍正元年(1723)举人。乾隆元年丙辰进士。历任国子监助教、翰林院编修、山东太学使、山东布政使等。著有《易经提要录》《书经提要录》等。《四库全书》收录《诗经提要录》一书,《四库总目》云:“大旨多本李光地《诗所》、杨名时《诗经札记》二书。盖铎为名时之门人,名时则光地之门人也。”

杨名时弟子潘永季撰有《诗辑义》《诗精义》两书,道光《续纂宜荆县志》卷九著录。潘永季,字方林,号纯甫,江苏清宜兴人。雍正七年(1729)举人,曾任国子助教,著有《易辑义》《笔述》等。道光《续纂宜荆县志》原注引储掌文曰:“先生年十五六谒杨文定公(名时),与讲明经术、经世之学。及入京,师主徐文定公(元梦)家,既而游李文贞(光地)之门,乃知天下之学问文章聚乎此也。是书赅述文贞,兼采两文定所论列,或间参己见,特体三公不尽之意,推类而引伸之,一洗解经经亡之失。”<sup>①</sup>潘永季《〈经史余论〉序》亦云:“余自束发后,即受业凝斋杨夫子(杨名时)之门。及官国子,复师事懿斋孙夫子(按:指孙嘉淦)。两夫子为当代大儒,著书充栋,发挥四书、五经之奥义殆尽。”潘永季先后师从杨名时和孙嘉淦,学术精进,渊源有自。

以李光地中心,杨名时、李钟侨、冉觐祖、夏宗澜、徐铎、潘永季等人授受往来,形成了一个小学术圈,潘永季、夏宗澜皆为吴人,进京而得晤名师,侍从请益,诸人研读《诗经》,各有撰述,《四库全书》及《总目》给与了高度的关注,发覆个中隐情,对于深化清代《诗》学研究或不无意义。

(责任编辑:张 升)

<sup>①</sup>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编著:《江苏艺文志·无锡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1142页。

## ***Siku Quanshu* and the Studies on *Shijing* in the Wu Region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IU Lizhi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Siku Quanshu*《四库全书》(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 and the creation and evaluation of *Siku Zongmu*《四库总目》( *General Catalog of the Complete Library in Four Sections* )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cholarship of *Shijing*《诗经》( *Book of Songs* ) in the Wu region. Many of the privately contributed books on the study of *Shijing* were mostly collected by the scholars from this region. The Qing court paid attention to Wu culture and scholarship, and carefully collected and included the works on *Shijing* by the scholars from the Wu region at that time. Schools of the scholarship in this regard represented by Gu Donggao, Li Guangdi, and Yang Mingshi all received special favor due to the Qing authorities' hidden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Keywords:** *Siku Quanshu*; Wu region; Li Guangdi

**About the author:** LIU Lizhi, PhD in Literature,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